

陈云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主 编 金冲及 陈 群
副主编 曹应旺

中央文献出版社

陈 云 传

(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主 编 金冲及 陈 群
副主编 曹应旺

中央文献出版社

本卷目录

十三、	进北平，赴上海	(595)
十四、	稳定物价，统一财经	(644)
十五、	调整工商业	(688)
十六、	抗美援朝中的财经工作	(719)
十七、	准备大规模经济建设	(750)
十八、	在“三反”、“五反”中	(784)
十九、	出访苏联	(812)
二十、	粮油棉统购统销	(842)
二十一、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出台	(879)
二十二、	两下江南	(924)
二十三、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962)

十三、进北平，赴上海

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标志着新中国将要诞生，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有一段风趣的对话。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周恩来笑着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①

怎样才能“考试及格”、不退回来呢？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是要发展生产、复兴经济，使人民过上好日子。中国共产党在准备进入大城市时，对这一点已有清醒的认识。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为了这一点，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

^①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

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①

能不能发展生产、复兴经济，关系着革命和新生政权的成败，成为当时全局中仅次于军事的重要工作。这就需要有一个经济统帅部，确定一个主管全盘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在进北平前早已经过深思熟虑，作出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和由陈云主持财经工作的重要决定。

当时担任中央财政经济部秘书长的薛暮桥回忆道：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南汉宸同志立即进城接收国民党的金融机构，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迁至北平。周副主席命我于二月二日赶赴北平，先见南汉宸，协助清查印钞票所需要的凹版机和纸张，计算印刷能力；同时按他的指示去见已先到北平的陈云同志和董必武同志，请示货币发行方针。董老偏重稳定物价，按每月上升百分之十计算。陈云同志说：货币发行方针应当首先保证解放战争的需要，其次才是稳定物价。三大战役胜利后，战争将向全国展开，军费开支浩大，物价应按每月上涨百分之二十计算，甚至有可能达到百分之三十。为什么要首先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人民币的印制计划。当时人民币的最大票面额已为五十元和一百元，按陈云同志的方针就应当准备印制五百和一千元人民币，否则就不可能满足需要。

“我回西柏坡后，立即向周副主席报告。他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并且告诉我，中财部即将改为中央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

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同志任主任。”^①

由陈云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中共中央很早就考虑到了。早在中共中央刚到西柏坡不久的一九四八年五月，周恩来就电告东北局：陈云主要工作目前应主持东北的、在将来则是全国的工业建设。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七届二中全会，并规定全会的任务之一是决定经济建设方针。北平解放后、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毛泽东于二月六日以中央名义起草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电，请陈云、罗荣桓日内动身来中央一叙。陈云、罗荣桓因路上融雪不好走，至二月九日到达西柏坡。在西柏坡，陈云住了两个晚上，于第三天返回北平。二月十六日，从北平动身，途经天津停留两天，于十八日回到沈阳。陈云后来回忆道：

一九四九年三月在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林彪、高岗参加了。我留守地方工作，罗荣桓留守军队工作，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在这之前，毛主席打电报来，要我和罗荣桓到西柏坡一叙。我们坐吉普车去的，经过保定，到达西柏坡。毛主席一见面就对我说：你四保临江啊！同周总理也见了面。我说：东北准备了二十万吨粮食，支援平津。吴波听到这个消息后，老跟在我后面要粮食。周总理说：董必武、薄一波现在搞财经工作，他们讲现在不能大量发行钞票，怕物价继续上涨。我说：现在还是要大量发行钞票，以扩大军队，支援战争，占领地盘，等全国解放后再来稳定物价。周说：这里面大有文章啊！大概是周总

^① 《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

理向毛主席报告了，毛主席就要我来搞财经工作。^①

陈云回到中央来搞财经工作，是经周恩来推荐、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的。薄一波说：“中央把整个财经工作委托给陈云同志，周总理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总理就对我谈过很多次，说：‘在财经工作这一点上，我们是依靠陈云同志的’。这充分说明总理完全信任和依靠陈云同志。在信任陈云同志这个人才上，可以说，总理起了不小作用。”^②

中共中央为什么挑选陈云来主管中央财经工作？一个重要原因是陈云领导财经工作有丰富经验和卓越才能。他在抗日战争后期主持过西北财经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主持过东北财经工作和接管沈阳工作，都取得突出成就，深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任。

在决定陈云来中央主管财经工作的同时，也正在酝酿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由于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处于彼此分割的状况，财政经济工作基本上各自为政。随着华北各解放区连成一片，中央决定在河北阜平县成立华北各解放区财经办事处，这比过去前进了一大步，但仍是一个各解放区带“联合”性质的财经机构，是一种过渡的形态。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到西柏坡后，周恩来提出：各解放区财经工作不能再搞“联合政府”，要搞统一政府，取消办事处，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部，并建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货币。^③ 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由董必武任部长，薛暮桥任秘书长，南汉宸负责筹建中国人民银行，

① 陈云的一次谈话记录，1989年4月26日。

② 访问薄一波的谈话记录，1981年9月11日。

③ 薛暮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回忆》，见《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页。

并准备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人民币。由于董必武不久担任新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中财部实际上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在此期间，统一财经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如发行统一的货币，调剂地区间的财力、物力等等。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和新中国的即将成立，许多新的更加复杂的任务又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需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对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实行统一领导。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考虑将中财部和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管理财经工作。一九四九年三月中旬，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并邀集各中央局、各前委负责人开过两次座谈会，逐条进行讨论，经过两度修改。这个文件，周恩来请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传阅时，毛泽东批阅并增写了部分内容，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下发执行。《决定》指出：“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的统一问题，应该是在分区经营的基础之上，在可能与必须的条件下，有重点地、有步骤地走向统一。”《决定》正式提出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并规定了它的职责权限：

“中央应即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首先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并加入东北、华东、西北、华中各区财政经济工作负责人为委员，依靠华北政府各部及其直辖的各省市，进行业务。”

“各解放区政府的财经部门，及各军区、各野战军的后勤部门，有责任向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与军委后勤机关、卫生机关，供给各项报告和材料。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与军委后勤机关、卫生机关，亦得向各区有关部门发给在中央

批准的计划范围内的各项指示。如遇有争执，或指示行不通时，得经过各区中央局、军区或野战军直接报告中央军委，请求解决。”^①

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主管中央财政经济工作，是一副多么艰巨的担子。陈云返回沈阳后即着手交代工作，准备挑起这副新的重担。三月二十六日，刘宁一电告陈云：苏联全国工人代表大会邀请陈云出席会议。陈云谢绝了。他回电说：“一因东北财经工作交代后即赴中央；二因自全总成立我均在做政府财经工作，未做工会工作，故准以别人去为宜。”^②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北平后，周恩来连发四电，催陈云早日来北平主持中央财经工作。

四月十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电：“望陈云同志及其所带干部速来中央”。这封电报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杨尚昆传阅后发出。

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又发电报催陈云来中央工作。五月三日，陈云回电中央：

“（一）陷（三十日）恩来同志来电悉。高干会后，我正向东北局报告今年东北经济计划。今日起讨论，估计十日前定赶到北平。

“（二）东北局已令曹菊如交代，力争曹与我同去平。

“（三）其他财经干部一时抽不出，可否缓调。”

在收到陈云五月三日回电前，五月五日，周恩来又起草中

① 中共中央《关于财政经济工作及后方勤务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1949年3月20日。

② 陈云给刘宁一并请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转中共中央的电报，1949年3月29日。

央致高岗、陈云电，指出：“二中全会前即决定陈云来中央主持财经工作”，二中全会后“数电催陈云亦均未得复”，“望陈云同志得电后立即动身来平，不容再延”。这封电报毛泽东阅后即发，发后再送朱德阅，催陈云来平的急迫心情跃然纸上。

看到陈云五月三日来电后，五月七日，周恩来再次起草中央致陈云并告东北局电：“辰江（五月三日）电悉。曹菊如应同来，其他财经干部待来后再商调。”同一天，陈云致电中央：“我九日一定离沈赴平，曹菊如尚未交代完，以后赴平再报。”但是，到了九日陈云仍没有能离开沈阳。又推迟了四天，在五月十三日才离开沈阳，十四日清晨抵达北平。

为什么陈云没有能尽早离开东北到中央就职？主要是因为东北有两件未了的事情需要他做。一件是，关于辽东争论问题。这件事在以前一直存在着分歧。这时，由于党内个别同志仍有不同意见，需要开会讨论，作出一个基本结论，以澄清是非。另一件是，他主持制定的一九四九年东北经济计划草案，需要向东北局报告，以便获得批准后实施。这两件事都很重要。陈云又是一个极认真、极负责任的人，办好这两件事需要一些时间。

中共中央东北局讨论辽东争论问题的高干会议，是在四月十三日至二十日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委书记、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正副部长，共八十余人。按照东北局常委会的意见，由陈云在这次高干会上首先发言。他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说：关于辽东争论问题，开个会讨论一下很有必要。因为有同志已正式提出与我有关的问题，有的有不同意见，有的不

知道经过。另外，我要走了，鉴定一下也好。^①

发言中，陈云谈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辽东土改中我的错误与责任”。他的态度光明磊落，说：“扼要有三：一、有很大错误；二、我负这个错误之责任；三、与辽宁省委在土改问题上有过的争论，我错误，他们对。”他指出：东北局对全东北土改的结论是，成绩是主要的，个别县区错误是主要的。这也适用于辽东。但是“错误者的责任在于追求错误之原因，改正错误”。去年三月东北局常委会讨论结束辽东分局工作时，我就作过检讨，并请萧华传达到各县。四月份我对中央有个报告，也有土改中错误的一部分。有同志说，萧华未传达。我在沈阳开会时，问过萧华，萧华说传达了。检讨的内容是什么？陈云在会上把检讨提纲重新读了一遍。随后作了两点声明：一、这个提纲自我批评可能有面的遗漏（十件只说八件），但自批的精神是充足的；二、不仅在这里而且可传达到各县，也可在党外传达。

第二个问题是“辽东我当分局书记任内坚持的经过”。为了使与会同志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陈云详细介绍了东北解放战争前期决定坚持南满斗争的决策过程，特别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六日这三天所作出的决定四纵“深入敌后做文章”的经过，并且回答了有人提出的“中央纠正之后才坚持的”这种说法。他用事实说话，指出：“中央对行动问题上在这个时间内无指示（我到后至四纵出发），分局与林总、东北局有几个有关行动问题的电报往返，但不是十六日前，而是十六日后，四纵出发后，约计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之间。”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陈云宣读了辽东分局与东北局在这个时间内往

^① 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干会议记录，1949年4月13日。

返的四封电报。并且谈到对萧华曾经提出的转移一部分兵力到北满的看法。他说：“时间半个月。决定权不是他，而是全体委员会，而且必然是东北局。作为一个过去的负责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允许的。领导机关也允许有第一第二的两步办法。萧华过去有成绩，坚持辽东决定后也积极努力有成绩。”

最后，陈云特意谈到对自己在南满这段工作的估价。他说：我向来不喜欢讲这些，现在有必要讲。在土改问题上，别人去了可能比我去了好。在坚持辽东问题上，有三种估价：陈云“去坏了”；“去不去一样”；去了“有不少帮助”。我“自估属第三种”。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够格不够格？够格”。从哈尔滨出发时，“明知困难，自告奋勇”。^①

陈云的这次发言是作了充分准备的。在这次会上，他谈了对自己这段工作的估价，这对陈云说来，是很不平常的。他对存在激烈争论的辽东问题，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错就是错，对就是对，毫不含糊。

在陈云发言后，有不同意见的个别同志也发了言。

这次东北局高干会议连续几天讨论辽东问题。在会上，程世才、彭嘉庆、刘澜波、吕东、林枫、郭峰、李富春、张闻天、王鹤寿、张秀山等三十多人先后发言。大家充分肯定以陈云为书记的辽东分局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张闻天在发言中强调，要解决辽东争论问题，首先应该了解，在敌人进攻面前南满严重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以及党内严重的危机，“有的主张转移，有的主张坚持”。张闻天说：“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了解陈云的作用。”“南满工作的转变，是在陈云来南满之后。

^① 陈云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干会上关于辽东问题的发言提纲，手稿，1949年4月13日。

陈云对改变南满党内党外的形势起了很大作用。陈云的作用，反映了南满很多好同志的意志，这一功是不小的。”南满在土改问题上，“成绩是主要的，方针基本上是对的”，但在对待中农问题上有错误，“这一点我们并不抹杀”。张闻天还说：我们“向陈云学习的地方有三点：一、谨慎小心的负责态度；二、实事求是的态度；三、自我批评的精神”。^①

在会议讨论中间，四月十六日，陈云第二次发言。这次发言，针对会上个别同志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答复。

四月十九日，高岗主持召开东北局会议，讨论这次高干会的总结。高岗说：当时想到，南满丢掉，北满成问题；北面的打，就是为了南面。陈云去就是为了坚持南满。^②二十日，高岗代表东北局作高干会的总结讲话。二十三日，东北局就这次高干会讨论的情况和得出的基本结论向中央作了报告。报告中指出：

“以陈云为首的南满分局是坚持与贯彻了东北局的正确方针，扭转了辽东在一个时期内的严重形势，完成了党给予的任务，成绩很大；辽东的土改，成绩是基本的，只是在对待中农的个别问题上犯了错误，但陈已作了自我批评并已经得到纠正。”^③

东北解放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工作千头万绪，应该从哪里着手？陈云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制订出一九四九年东北经济计划草案，在他离开前对如何恢复东北地区的国民经济作了比较全面的安排。

① 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干会议记录，1949年4月16日。

② 中共中央东北局例会记录，1949年4月19日。

③ 中共中央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49年4月23日。

四月二十二日，高干会开完两天后，陈云就在东北局会议上作一九四九年东北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出席会议的，有高岗、李富春、张闻天、林枫、古大存、张秀山、李锡五、王鹤寿、顾卓新、叶季壮、曹菊如、吕东等人。陈云本着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在报告中首先回答了计划的范围和可靠性问题。他说：这个计划“主要是国营企业的经济计划”，是在研究了资金、原料及材料、运输和技术问题之后制订出来的。完成这个计划的“初步条件是有的，但困难甚多”。因此“不是‘漫天’计划，有较大可靠程度”。

在谈到经济力量使用的重点时，陈云指出应该放在恢复工业上。他说：我们目前的财政支出情况是，要“负担东北野战军七个月经费，军事费用占了很大的部分”；“国民经济投资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一二，其中工业投资占百分之二十六至百分之二十七”。工业投资的重点是恢复重工业。比如，鞍山、本溪的钢厂，抚顺、本溪、阜新的煤矿，有色金属，机械工业，小丰满水坝，火力发电，等等。

谈到物价问题时，陈云说：“力争物价相对稳定，力争涨价不超过百分之一百，争取只涨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他提出力争物价相对稳定的三道防线：财政开支不靠发钞票；准备了物资；收营业税和卖公债。

谈到铁路问题时，陈云强调铁路运输对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重要性，说：国营经济建设的第一条链子是投资，第二条链子是铁路。“每天装车量有多少是中心问题。”东北现有车皮为一万二千至一万四千辆，每天平均装车三千辆，周转率为四点五天。要照顾“铁路第一”的原则，使火车快装快卸。要不惜花钱，把铁路修好，减少徐行。

谈到成立总会计局时，陈云从管好和用好资金的需要出

发，说：这是一个“总账房”，“使现金能集中我手”。“将来经济的管理机构是：一、计划委员会；二、总会计局；三、统计局。”

谈到明后年经济工作的方向时，陈云针对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说：寻找工业投资来源的办法是“以猛烈方法刺激农业副产品的生产和增加棉田”。如能出口三万吨猪肉，等于增加二十万吨粮食；生产三亿个鸡蛋，等于增加十万吨粮食。要增加棉田，就要给棉农以很大的便宜，不收公粮，与粮食比价定为一比十五至十七。猛烈刺激农业副产品的生产，表面上是不赚钱的，实际上通过税收还是赚了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办法基本上靠征收公粮和制定价格政策。^①

四月二十三日，东北局继续开会。叶季壮、吕东、余光生等分别就财政问题与商业问题、工业问题、铁路问题作补充发言。五月三日，东北局讨论陈云报告的一九四九年东北经济计划草案，并通过这个计划。

东北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又有着最大的连成一片的老根据地。制订好东北的经济发展计划，对陈云准备主持中央财经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陈云是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结束时到东北开辟工作的。他参与了领导东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这四年，对他来说，是很不平凡的四年，也是很重要的四年。

陈云离开沈阳时，他和于若木的第四个孩子兰兰刚出生不久，妻子和孩子们仍旧留在沈阳。陈云带着一个小女孩，那是毛泽东的大女儿娇娇（即李敏），她是去北平看她的爸爸的。

① 中共中央东北局例会记录，1949年4月22日。

火车到山海关被堵住了。山海关是连接东北地区与华北地区的咽喉，来往车辆多，加上当时的铁路交通正处在战争破坏后的恢复过程中，常有列车被堵。幸亏有吕正操在现场调度，很快就疏导好了。到北平清华园火车站后，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接娇娇去香山，陈云等人直去中南海。^①

周恩来曾提出陈云“带干部速来中央”。然而，陈云并未带其他干部进北平。周太和回忆说：陈云“只带了我（秘书）一人及警卫二人共三人。陈云同志强调，到新岗位任职，应当就地取材，绝不能随带袖筒里干部（指熟悉和亲近的人），要引为戒律。”^②

当时，毛泽东还住在北平西郊的香山双清别墅。周恩来为工作方便已迁居城内的中南海。陈云被安排住在中南海怀仁堂。他和周恩来朝夕相处，共商财经大事，还经常一起去香山参加毛泽东、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会议。后来，毛泽东要搬到中南海居住，周恩来考虑到自己住的院子比较安静，就让出来请毛泽东住。那就是毛泽东从一九四九年一直住到一九六六年的菊香书屋。周恩来搬到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办公、居住。陈云搬到与中南海一街之隔的北长街七十一号（后改为五十八号）居住。这是一座不大的院落，一栋二层小楼毗邻著名的故宫护城河。从二层陈云的办公室里望去，一片金黄的琉璃瓦顶在夕阳下熠熠生辉。

陈云到北平后第一件事情是物色干部，找租房屋，筹备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物色干部，焦善民回忆说：“这个问题不解决或解决

^① 访问张季敏的谈话记录，1998年5月31日。

^② 周太和《周总理和陈云同志在建国初期》，1993年3月。

得不好，中财委即使有再大的权力也难以做好财经工作。而实际情况是，不要说我们党由于长期处在农村，长期进行革命斗争，缺乏经济建设的人才，就是旧中国，也没给我们留下多少这方面人才。怎么办？陈云同志的办法是不拘一格，广泛招收人才。”陈云“在德才兼备的前提下，搞‘五湖四海’、‘就地取材’。中财委是在原中央财经工作部和华北财经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的，因此，一开始，华北的干部用得比较多。以后，又陆续增加了各个大区的干部。另外，陈云同志还特别注意选用有经济才能的党外民主人士。他曾经说过：‘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要用，只有这样才能成大事业。我们能不能说只有共产党员才是了不起的人才呢？不见得。社会上的人才不知有多少，许多人都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要有的气量，善用各种人才；单枪匹马，革命到底是干不成功的。’”^①

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等人是陈云进北平后很快注意到的懂经济的党外民主人士。陈云经常同他们交谈，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有一天，晚上十点钟了，陈云还要章乃器给他上课，讲外汇问题。^②五月二十日，章乃器给陈云打电话说，千家驹和沈志远要和陈云谈谈。二十一日，陈云约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到自己住所谈了几个小时。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提出：向香港商人购买棉花应尽快着手。陈云就请章乃器代他起草给香港钱之光电报稿，加以落实。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提出：上海解放后，外币应禁用禁持。陈云就请千家驹写个禁用禁持外币的意见，发给上海、华东。千家驹曾回忆他

^① 焦善民《陈云同志与中财委的队伍建设》，见1996年4月9日《人民日报》。

^② 陈云《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说明》，1949年6月4日。见《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9页。